



藝術與鑒藏

王立翔
汪涛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中国外销瓷

柯玫瑰 Rose Kerr 著
孟露夏 Luisa E. Mengoni 著
张淳淳 译

V&A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中国外销瓷

柯玫瑰 Rose Kerr
孟露夏 Luisa E. Mengoni
著——张淳淳 译

艺术
与
鉴定

王立翔
汪涛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外销瓷 / (英) 柯玫瑰, (英) 孟露夏著.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4.4 (艺术与鉴藏)

ISBN 978-7-5479-0537-1

I. ①中… II. ①柯… ②孟… III. ①瓷器 (考古) —
中国—图录 IV. ①K87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664号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12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2-500号

中国外销瓷

(英) 柯玫瑰 (英) 孟露夏 著

张淳淳 译

责任编辑 王 剑 睦菁菁

审 读 朱莘莘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岳文婧

技术编辑 杨关麟 包赛明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c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sh@163.com

制版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画中画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300

书号 ISBN 978-7-5479-0537-1

定价 128.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中国艺术品的鉴藏源流及其他（代序）

艺术品鉴藏的历史，与艺术的发展历史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与人类艺术行为起源并不同步。不过人类收藏活动的源头仍可追溯至人类的史前时期，主要是对食物的贮存和早期生产资料的收藏。这种收藏活动经过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经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技术和文化条件支持、催化下，不断地附加并融合外在的功能，灌注了收藏者更多的动机和精神寄托，逐渐演化为一种复杂、高级的人类社会行为。

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距今有五千年之遥的许多重要遗址中，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史家判断当时已出现了较严格的等级制度。依据就是玉器的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员去寻矿、开采、运输，大量的时间去切割、琢磨、制作，其形制之不同，更是蕴藏了丰富的寓意。玉器在当时条件下具有无比珍贵的意义：它从原始的装饰物，发展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部落活动——祭祀的礼器，以及王室、贵族权力、身份象征的配饰和仪仗。因此，玉器也被认定为中华民族最早具有“鉴藏”属性的艺术品之一。

以此为起点，中国的艺术品鉴藏活动开启了至少五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从此，中国人高超的艺术创作，与发达的鉴藏活动相伴相生，鉴藏活动的起伏，又与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盛衰休戚相关。历朝历代的艺术品为国人鉴藏活动之发育和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对象，而伟大的文明进程和长期稳定的社会形态，为鉴藏活动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存在基础。中国艺术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发展时期形成了独有的根脉和系统，它与华夏民族的宇宙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以及技术工艺紧密相关，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使艺术家的奇思妙想有可能成为千姿百态的物之形态，使众多的实用器物变成了艺术品而留存于这个世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铜、秦汉古玺、魏晋书法、唐宋绘画、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国文学之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般著称世界，并被公认为世界之瑰宝，艺术之巅峰。它们构成中国艺术品发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鲜明地刻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更是历代鉴藏家财富和见识的骄傲，价值和精神的寄托。

伟大的艺术成就为艺术品鉴藏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作为鉴藏者的活动仍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更与文化观念和时代风尚紧密相联，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期鉴藏者的主观思想。

在中国，鉴藏这种社会行为很早就与政治和礼制相关联，这一点与早期的艺术品功用有关，另外，因其财富的属性，它也代表了社会地位和权力意志。在物质条件匮乏的上古时期，财富高度积聚于上层社会，能有鉴藏行为的均为少数贵族和王室成员。“子子孙孙，勿替引之”（《诗经·小雅·楚茨》），是他们渴望财富、地位延续的最好注脚，他们将“子孙永葆”之类的文字契刻在甲骨、礼器之上，以昭示这些宝物来到他的身边，是上天意愿，并告诫子孙世世珍惜、千秋不易。这无疑是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共同梦想。因此，统治阶层为维护既得利益、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建构了宗法等级制度，不仅以“礼之教化”施之于民而“止邪也于未形”（《礼记·经解》），且将具怡情悦性的艺术品也赋予“成人伦，助教化”的道德教育功能，这些都成为以后统治阶层以宣示政教为主流价值观念的源头。然而社会的鼎革和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总是残酷地击破这些一厢情愿的美梦。因与财富和统治意志相关联，艺术品及其收藏者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动荡共沉浮。《春秋左氏传》中就记录了大量宝物重器被频繁取用于政治外交，甚至于以求重器为借口而不惜杀伐征战的例证。

因此，中国早期的艺术品被赋予了复杂的社会职能，由此而产生的鉴藏观念也远远超出了对艺术品本身的关注，比如“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玩物丧志”、“不贵异物贱用物”等等思想，都是中国早期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观念的起源，有的直接来自艺术品及其主人在历史洪流中的经验教训。最为著名的例证就是“和氏璧”，它的传奇命运，堪称是所有鉴藏故事中的极致代表，它承载了人类由鉴藏而生发的几乎所有的思考和情感。

早期史籍中大量涉及宝藏流转的相关记载，一方面说明春秋时期艺术品的藏、用活动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另一方面，则体现了鉴藏观念与统治者利益和意志密切相关，它影响了社会的价值观念甚至国家行为。

值得一提的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彼时中国大地进入政权交替割据的局面，中原大批人口，尤其是社会精英多迁徙江南。因大一统的政治、军事格局被打破，独尊的儒学失去政治的庇护而大为颓弱，文化思想迎来类似战国时期那样的自由活跃环境，其中以玄学和佛教思想分别迎得知识和世俗阶层的推崇而风行尤甚。在这三百余年间，主要在南方，文化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在物质和技术条件支持下，以卷轴书画为主要鉴藏对象的艺术作品为更多的文人雅士所推崇，鉴藏活动冲破了统治阶层的权贵屏障。他们以卓越的才华，乘文事之盛，将文学、人物的品藻之风与艺术鉴赏相联系，大大开阔了艺术品鉴藏的审美视界和精神疆域，丰富了秦汉以降对艺术品功能、价值的认识，这种新思想影响了此后历朝上至帝王下至民众，尤其是占艺术品鉴藏活动主体的士大夫群体，成为以后中国艺术品鉴藏的重要特征和理论体系的核心。

如前所述，中国鉴藏史的跨度大约有五千年之久，而期间以史料遗存和获得的不一，我们对

各时期的认识也差异甚大。但大致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观察其发展流变的总体状貌。

1、皇家收藏，是历代鉴藏活动的主体

早期的艺术品从其基本特性中延伸的品类群生、彰显教化、煊赫治功的功能，就是王权有意宣示的各种表现，因而为帝王所看重。而随着艺术品形象、直观、美化、娱情等艺术本体特性发育得愈加显著，艺术创作的精神性沟通和悦目游艺的自由舒怀，得到了鉴藏者，尤其是王室的更为充分的认识。历朝帝王，尤其是那些对艺术品抱有浓厚兴趣、鉴赏眼光高人一筹的帝王，把以强权而“富有天下”视作天经地义，他们利用地位和权威，建府立制，或笑纳各方朝贡进献，或收罗天下珍品异宝，充栋内府禁苑；或调集天下名工巧匠，以为己用，形成以礼制政教为主体的“官家”宫廷艺术；他们的作为和标榜，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后世鉴藏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历代的鉴藏活动的主体是皇家。这一现象无论是传世艺术品自身，还是在各种史志、著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2、文人风尚，引领了民间私藏活动的潮流

与皇家相对应的是民间，不过这个鉴藏群体的主要构成是贵族、宦官和富商，一般平民布衣是无法跻身这个以财富为基础的特殊领域的。这其中文人士大夫逐渐成为这个群体的意见领袖，他们有的以开阔的知识视野、深湛的学问根蒂、较高的艺术品味，不断探寻和开掘了鉴藏活动的内在精神世界，有的甚至亲身参与艺术创作，将思想趣味与艺术表现相融合，标榜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分野雅俗之间，形成了不同时期的风尚。知识阶层大范围介入艺术品鉴藏活动，也起端于魏晋时期。从此，鉴藏活动与文人结缘。知识阶层的介入，大大推动了鉴藏活动内涵的完备和形式的丰富。如齐梁谢赫、北周姚最等一大批具有品鉴眼光的文人士大夫从事书画鉴藏活动，不仅开启鉴藏著录一科，更大大推进了艺术品鉴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及至北宋欧阳修、赵明诚、吕大临等怀经史之才，以金石学开启了鉴藏研究的崭新门径，且为鉴藏学规范的确立建有筌路蓝缕之功。到了明清两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以及地下碑刻器物出土的增多，公私鉴藏异常繁盛，受朴学的影响，一些阁僚高官和学界大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学术探究、引领鉴藏的作用，如文徵明、钱谦益、翁方纲、阮元、何绍基、陈介祺、吴大澂等都成为知名的学者型鉴藏家。文人士大夫在鉴藏活动中地位的不断凸显，与他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的地位变化极为有关。

3、鉴藏活动的盛衰，与历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密切相关

纵观历朝的艺术品鉴藏之发展，每逢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正是鉴藏活跃发展的的大好时期，而鉴藏的重要对象——各种艺术品，包括字画和瓷器、铜器、玉器等各种古器物，本身也是前、当代社会昌明文化发达的结晶，这印证了与艺术有关的技术条件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鉴藏活动开掘了艺术品的经济价值，推进了艺术的实践探索和与之相关的工艺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财富特性的愈加彰显，艺术品也诱发着人类本性中自私奢靡乃至贪婪的阴暗一面，因而随之产生了巧取、豪夺、贿赂、厚葬、盗墓、作伪等等与鉴藏

相伴随的种种肮脏行为。

4、皇家鉴藏高度聚集，造成中国历代艺术品亦得亦失

如前所述，历代鉴藏活动是以皇家度藏为中心。数千年以来，历代帝王一直自视中华为文明之邦，有着崇尚文物，聚蓄典籍、宝藏的传统。《历代名画记》所记汉武帝“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或许是史料记载下的皇家首次大收藏行动。后代的帝王纷纷效仿，尤以新朝初立为甚，并不断在体量上扩充，以至天下宝物，收罗殚尽。如此高度聚藏的结果，就是所藏文物命悬国运，而最终等待的是王朝倾覆、累世所藏毁于一旦的悲剧。类似浩劫几乎每遇重大战乱、帝都失控，历朝都会悲剧重演，屈指数来，宫廷度藏之殇，竟有十次之多，而造成的损失，实是华夏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宫廷收藏是封建帝王专制统治下的必然产物，作为鉴藏史之主要构成，其始末成因，所得所失，洵足后人深刻探究和反省。

5、分野于鸦片战争的中国艺术品域外鉴藏

无论是从中国鉴藏史的完整性还是从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同视角来看，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些区域、国家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当时关系各不相一，所受文化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鉴藏的情状也各不相同，对这些情状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意义。

域外鉴藏首先要研究中国的艺术品是如何“走出去”的。中国虽然西困高原沙漠，东濒滔滔大海，但艺术品鉴藏活动的范围绝不仅限于中国本土，最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分别最晚于秦汉完成了与周边邻国的沟通。借助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国艺术品必然早早地担负起文化、经济交流的使命，丝绸、瓷器因最受域外民族的欢迎而成为了中国制造的主角，甚而演为中国的代名词。到了盛唐，对外贸易线路发展到了七条之多，距离、规模均创空前。虽然丝路海上此消彼涨，但中国艺术品出口的态势基本未变。直至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船炮彻底轰开，贸易主导的方式完全颠倒，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活动的性质截然改变。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捩一样，鸦片战争（以圆明园劫难为标志）成为中国域外鉴藏活动的转折点。

1860年的圆明园劫难，不仅导致了这座旷世园林和一百五十万件艺术品直接被损毁劫掠，更开启了近世中国文物不断流散的噩运，成为中国鉴藏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就在清王朝命数将绝之时，又先后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殷墟书契和敦煌宝藏，正值动乱的中国无力看护这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大发现，仅敦煌文物就被英法俄日美等国以多支探险队名义巧取掠走至少二万六千余件。进民国，仍国事动荡，战乱连绵，从出土到传世，从故宫到民间，国内外各种势力和个人利用抢掠、偷盗、贿授、骗夺、私贩、交易等种种手段，导致中华文物频频流向海外，以至无法计数。所幸的是在此间的历次战火中，中国艺术品最重要的遗脉——皇家珍藏，历经万险，虽此后海峡相隔，但大体未损，仍在中华子孙手中，也算创下下一个鉴藏史上最庆幸的奇

迹。直至新中国建立，动荡逾百年的一段伤心史终于划上了句号。

中国艺术品身处异邦的命运及其产生的影响，是鉴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从近世算起，中国艺术品在域外的历史也已经将近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在如此漫长而又背景不同的历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付出惨重代价，我们历数那些人和物，心中不由泛起复杂的感情。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成就逐渐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尤其在今天，中国综合影响力的上升，更推动了中国艺术品珍贵价值的再认识。客观上，域外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明成就一起，汇聚成了人类共同进步的光环。

我们梳理了中国艺术品鉴藏的一些源流及部分特性，就可以感受到“艺术品鉴藏”一门，有着极其丰厚的内容和复杂的历史轨迹。它可能由物（艺术品）或人诱发一段机缘，产生复杂的事态、感情甚至思想，由此开启一段物（艺术品）的“生命”历程。这一“生命”也许片刻夭折，也许顽强地生存且超过几十代人总和；它与同它的不同主人恩恩怨怨，历尽磨难，也犹如沧海一粟，见盛观衰，尝尽世态炎凉。它诞生于一方特殊的土壤，满身中国的基因，读懂它鉴别它珍视它，需要与它一样植根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中；评估它研究它欣赏它，需要积聚它历任主人的学识素养，并发扬超越前人的才华智慧和无微不至的爱心的。

中国艺术品鉴藏就是这样一项富有神奇魔力的人类活动，它贯穿构想、制作、鉴别、流通、度藏、欣赏等多个过程，每个过程既与艺术创作发展及其精神诉求有着紧密的关联，又有其自身的内在特性和规律，都需要专业手段和学科知识的支撑，涉及诸如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心理等等领域，拥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精神世界。中国艺术品鉴藏历史如此悠久，近十几年来也已成为十分热门的行为和受关注的话题，但深入关注鉴藏内涵和史实研究的工作却并不多，而呈现出鉴藏界人士追逐利益多、鉴藏行为鱼目混珠多，问题研讨浮于表层多的现象。中国的鉴藏研究必须要向更高的学术水准发展，或有以下几项工作亟需得到学界重视：

1、加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和体系要求的鉴藏学科建设

如上所述，与鉴藏学有关的领域如此众多，那就意味着它必然是一门交叉性学科，需要足够开阔的学术视野、结构多元的知识作基础，去总结传统的鉴藏学问和手段，吸收其他成功学科的经验，逐渐架构起一整套严谨的系统方法。这项工作在中国起步晚，虽有诸多有识之士推动，但相关的教学或研究往往仍限某一局部，尚未迈出整体的、学科建设性的步伐。

2、加强追踪、梳理世界范围内中国艺术品的往世今生，加快挖掘、整理相关的历史文献

这是鉴藏学科发展和研究的基础。如上所述，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艺术品散失的情况非常严重，令人应利用各种条件弄清历史上和现存的中国艺术品状况。另外，有关中国鉴藏方面的文献，总体上呈前疏后详的特征，如何去伪存真，辨析纷乱的信息，相关专家应继承、发扬中国学术传统，系统整理史料，开掘传统著录之外的海内外新文献，以便今人站在前人肩膀上，去接近历史的本相。

3、要融汇相关的学术成果，运用客观的史观、严谨的方法，将个案研究和宏观论述相结合，来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的鉴藏史

一方面，我们要将鉴藏史放入中国历史之中，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去探寻接近人（收藏者）—物（艺术品）—事（过程）的真实，去追寻它们之间的关系、缘由和潜藏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要用更宏大的视野，将中国鉴藏史放置于世界的格局中，去直面、探寻、记录、辨析在异乡他国的中国艺术品鉴藏的行为、过程及其理解、认识，去审视中外有关鉴藏文化的异同，这其实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世界中之价值命题追问的延续。

4、要从艺术与鉴藏之间的关系，来审视两者的相互作用

艺术品是鉴藏的对象，在一定条件下，其作用关系发生互换。鉴藏的主观意愿或形成主导或分化群体风尚，又作用于艺术品的创作；随着鉴藏者欣赏口味的变化，艺术创作的审美趣味、创作观念、方式风格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而随着鉴藏活动的深入，艺术作品价值的提升，艺术品的作伪和鉴伪也应运而生。艺术与鉴藏之间，在不同时代，产生了无数的案例和经验教训，是鉴藏一门需要花大力气去梳理、研究的课题，也是对当今鉴藏活动最有现实影响的主题。

艺术品鉴藏是一种社会活动，也是一种精神活动。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的中国艺术，以其独特的呈现方式屹立于世界之林，并以其东方精神，滋养着每一位与它相视而会意的观者、藏家。这就是中国艺术品鉴藏的魅力所在——人与藏品达到“相知”、“通神”的境界。鉴于中国艺术品鉴藏其内涵如此之丰富，而与之有关、亟需去展开的工作如此之多，我们从三年前就开始探讨如何搭建平台，搜寻、组织、出版海内外史料翔实、史论交互、方法新颖、主题鲜明的高质量研究著作，为开掘尘封已久的史料，厘清错综迁延的鉴藏史脉络，寻绎和逼近历史真相，尽些所能。如今终于迈出实质性一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所有参与者的倾情付出，也期盼海内外更多的学界朋友，来为中国艺术品鉴藏研究的深入，作出共同的努力。

主 编

2014年3月

目 录

中国艺术品的鉴藏源流及其他（代序）	005
第一章 导 言	001
第二章 外销青花和彩绘瓷器	019
第三章 特别订单：纹章瓷	047
第四章 特别订单：欧式风格的装饰和器型	077
第五章 装饰附件和在欧洲装饰的瓷器	115
第六章 欧洲以外的市场：为日本、中东、印度和东南亚制作的瓷器	153
第七章 来自汕头、德化和宜兴的外销瓷器	187
参考文献	206

第一章 导言

位于伦敦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拥有惊人的丰富馆藏。本书正是依托这些宝贵的馆藏，向读者讲述一个关于被出口至世界各地的中国陶瓷的故事。尽管无法囊括中国外销瓷器的每一个时代的每一种器型，但这些馆藏本身就已经足够吸引人了。本书将主要聚焦在明朝（1368—1644年）中叶以后至清朝（1644—1911年）的中国瓷器，时间跨度从16世纪到19世纪。当然，书中还包括了几件早期的代表瓷器。受限于博物馆的馆藏资源，书中所介绍的这些中国外销瓷器的出口目的地主要是欧洲市场，也有一小部分是专为中东和亚洲地区生产的。尽管如此，在本书中，我们将结合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最珍贵的藏品，介绍最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高温釉瓷器的国家。从最初几个世纪开始，中国就开始出口这些垄断产品。从9世纪起，瓷器已经成为出口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主要贸易产品，但直到14世纪，欧洲人很少会收藏瓷器。到了16世纪，欧洲商人才建立起了与中国贸易的直接通道。1557年，葡萄牙人最早在澳门建立起了永久性的对华贸易关系。17世纪时，一批大型国立贸易集团“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ies）令人瞩目。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最先抢占统治地位，随后是18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其他国家也在亚洲展开利益争夺，比如，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瑞典东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由奥地利皇帝特许的东印度总公司（Generale Keyserlijcke Indische Compagnie）（别名：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Company），以及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建立的皇家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siatische Companie zu Emden)。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商船也开始进行频繁活跃的贸易。

成立于1600年的伦敦东印度公司在1708年与较晚建立的公司合并后，组成“荣誉东印度公司”（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HEIC），进而成为当时在亚洲地区最有势力的欧洲贸易机构之一。大型餐具原来都是提供给公司在印度的高级官员使用的，如图1饰以公司藏书票纹章的餐具。这套餐具来自印度马德拉斯（Madras）（现名金奈，Chennai）的圣乔治要塞（Fort St George），是当时英国在亚洲贸易的中心。这套餐具很可能是为了公司一百周年纪念而订制的。许多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在他们印度任期结束时，将部分餐具带了回来。由此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水果篮和托盘会在1898年时进入了博物馆。英国的订单一般都通过位于印度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总部运送，官员们从这里向中国订购瓷器。图2的杯和杯碟属于托马斯·桑德斯（Thomas Saunders），他在1750年至1755年期间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

图1
镂空水果篮和两个托盘，饰以“荣誉东印度公司”纹章

1800年
果篮宽度：17.5厘米
托盘宽度：20.4厘米,15.6厘米
编号V&A:335F,E&J-1898

的主席一职。¹

虽然英国人过去喜欢将他们的公司称为“荣誉东印度公司”，但是1991年，历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eay）强调说，这个公司事实上只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管理服务机构，它所有的行为都是趋利的，常常是不体面的，几乎从来都不是“荣誉”的。²这是中国的不幸，因为在18—19世纪期间，在英语国家中没有一人会这样来描写这家公司。而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则撰写了大量抹黑天朝大国——中国和其国民的报告。直到1926年，何西·巴罗·摩斯（Hosea Ballou Morse）出版了一部完整的《东印度公司编年史》，在书中，他表达了对这个自己长年生活工作的中国的蔑视。这只是对于中国的全部解释的一个开始，2002年故宫档案中关于这部分的历史才第一次公之于世。



图2
杯和杯碟，饰以英国桑
德斯家族纹章
1750—1755年
杯高度：17厘米
杯碟直径：13.2厘米
古兰（W.G.Gulland）遗赠
编号：V&A:C.347&A-1931

18世纪的广州，瓷器和东印度公司

英国东印度公司总共运输了上百万件瓷器到西方。在这部分中，我们会看到由中国最大的两个客户——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为了庆祝一些活动或荣耀家族而订制的瓷器（本书在第三章中将全面介绍欧洲纹章瓷）。对于这些瓷器的研究提供给我们许多重要的信息，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广州成为贸易中心，许多西方作家对此有过详细记载，其中部分已经列入本书的参考书目。

图3所示杯和杯碟制作于1728年之后不久，作为荷兰贸易历史上一次重要活动的纪念品。它们被装饰以当时最新流行的粉彩手法，设计图案则是复制了荷兰人在1728年铸造，专门用于亚洲贸易中的一种银币的反面图案。整个图案甚至复制了银币的边缘齿轮的纹饰。这是荷兰最早允许铸造专用于亚洲贸易之钱币的时间，这也说明了商人们对及时供应的贵金属钱币的需求。这种钱币和这套杯和杯碟都饰有荷兰共和国的纹章，下方饰有一组带有VOC字样的纹章（代表荷兰东印度

图3

杯和杯碟，饰以荷兰共和国纹章

1730—1735年

杯高度：3.5厘米

杯碟直径：10.5厘米

编号：V&A:645B&C-1907

图4

式样盘，饰以Syngchong标志

1790—1800年

直径：24.5厘米

R.A.Pfungst捐赠

编号：V&A:C.121-1923







图5

餐盘，饰以阿姆斯特丹的华尔庚尼尔家族纹章，在四个对称椭圆形装饰框中分别描绘了在克莱夫的威廉国王城门，一个荷兰小镇以及巴达维亚的景象

1735—1740年

直径：22.8厘米

巴西尔·艾奥尼迪斯（Basil Ionides）遗赠

编号：V&A:CIRC.154-1963

5

公司)。在纹饰的边缘则写着荷兰共和国的拉丁格言“团结就是力量”（*Concordia res parvae crescunt*）和“1728年”。³

18世纪，荷兰人订购了大约600—700套纹章餐具，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730年到1760年之间。在18世纪早期，一套餐具一般不会超过50件，主要包括各种不同尺寸的餐盘。到了18世纪30年代后期，西方客户开始要求一些更完整的餐具组，其中包括了额外的盛汤器，船型酱汁碗和盐瓶等。1740年以后，一些特殊餐具，例如水瓶和水盆组合，变得越来越普遍，器型和装饰也变得更为欧式。⁴广州的承包商们很快在技术上适应了新潮流。各种欧式纹样一应俱全，图4的瓷盘就是个很好的例证。这个瓷盘的背面用优雅的黑色手写体写着商人Syngchong名字的英文拼写和一组“EFM”的字母组合纹样。在瓷盘的正面，绘有一个内饰有“FE”和“IM”两组字母组合纹样的椭圆形图纹，以及一个盾形图纹，内饰有“WF”字母组合纹样。盘边装饰以双层饰边，分别饰以编号为21、22、23和24的装饰图样。这个有趣的装饰盘显然是当时制造商用来展示各种设计图样，以供客户选择想要的装饰组合而特别制作出来的一系列小样的一部分。



图6
餐盘，饰以英国杜特里家族纹章，辅以
雷内（René）家族纹章
1720年
直径：49.1厘米
库克（P.Cooke）捐赠
编号：V&A:FE:110-1978

图5所示的餐盘装饰十分精巧，饰以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埃德里安·华尔庚尼尔（Adriaan Valckenier, 1695—1751年）的纹章。1740年在巴达维亚（Batavia）发生“红溪惨案”之时，这位官员被提升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这一事件的发生是由大量失业的中国商人和移民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发生冲突所致。大批的中国商人和移民在前任总督的鼓惑下来到荷兰殖民地，却由于当地的贸易滑坡导致他们集体失业。于是，荷兰人企图限制他们的活动，将他们运送到其他的殖民地，而这一行动因为一些关于荷兰人会在中途丢弃这些华人的谣言而无法实施。于是爆发了骚乱，而残酷的镇压致使许多人丧生。华尔庚尼尔订购了至少15套纹章瓷器餐具，总共3500—4000件，其中1000—1200件被保存了下来。⁵这件餐盘的盘缘上使用墨彩技法勾画了从铜版画上复制的图样。这种装饰技术使得工匠可以轻易地重现版画和铜版雕刻作品中的明暗变化效果。餐盘左边画的是位于荷兰克莱夫小镇（Cleves）的威廉国王城门（King William Gate），上方画的是一个不知名的荷兰小镇，右边描绘的可能是位于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仓库，而在下方则是华尔庚尼尔的家族纹章。⁶